

# 以？為鑒

● 辛 采

一

據《新唐書·魏徵傳》所記，魏徵死後，唐太宗很動感情地說：

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鑒，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鑒亡矣。

此言一出，千載響應。特別是其中的「以古為鑒」，對於政治家、治國者是一個極大的啟發，也使史學家找到了自己事業的社會價值和政治意義。它直接開啟了宋代的史學昌盛局面。宋神宗把司馬光主編的一部中國通史著作就逕直命名為《資治通鑒》。自此以後，在中國歷史著作的浩瀚大河中，通鑒體史書（包括其變種「綱鑒體」）遂成為與傳統官修的紀傳體正史並駕齊驅的兩大主流之一。朝廷設「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給皇帝講解文史也成為常制。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英明

之主，聰明過人。雖然他實際上並未完全做到「保有三鑒」，但他能自覺地認識到「三鑒」之可貴，正是他的過人之處。觀察歷史與現實，保一鑒容易，保二鑒難，保三鑒少見。

古人以鑒為鏡，後又以銅為鏡。現代製鏡技術高超，對鏡子的使用空前廣泛，從女士的手袋到公共場所的牆壁，無處不有鏡子供人觀照，可見人們對「以銅為鑒」的需要。照鏡子不僅要使自己的衣冠正、面貌清，現代人更追求在鏡中顯示出一種服飾高貴、品格優雅的境界，以提高自己的社會交際形象。但是，「以人為鑒」就難了。儘管孔夫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是對「以人為鑒」的最好注腳，但因為對「賢」的理解因人而異，所以世上的「賢人」並不很多。而且即使是見到了真「賢」，也並不是人人都能借鑒得了的。《莊子·天運》記載這樣一個故事：

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

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其實，美人都是不能摹仿的；不僅「其里之醜人」不能效顰，就是原有幾分姿色的人要去生搬硬套別人的做法，也必然會適得其反。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藝術出於摹仿，那是指藝術對生活的摹仿，而不是說藝術對藝術的摹仿或藝術家對藝術家的摹仿。齊白石談藝有一句名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以人為鑒」與摹仿的界限必須劃清。摹仿美是虛美，摹仿善就是偽善。

明末山東有個豪強叫李青山，嘯聚梁山，破城焚漕。據說他對於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以及如何爭取朝廷招安的知識，全部學自《水滸傳》。崇禎十五年（1642）初，他在向朝廷請求招安的同時，又連破東平、張秋兩城，搞得官府相當狼狽。草莽英雄初起，沒有軍事知識，不懂政治鬥爭策略，這些稗官野史就成了他們的啟蒙讀物。他們多沒有受過正統教育，讀不懂《六韜》、《孫子》、《吳子》等兵書，也分不清歷史書與文學作品的區別，遂把這些通俗小說當作自己行事的指導書，這也許是對「以古為鑒」的最好實踐。不獨李青山如此，據劉鑾在《五石瓠》中記載，大名鼎鼎的張獻忠也不例外：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擊咸效之。

清初滿洲武將多不識漢字，清太宗曾命大學士達海、范文程等翻譯《孟子》、《通鑒》等漢籍，在最初選定的書目中就有小說《三國演義》。他們

把《三國演義》看成是比《六韜》更重要的「兵書」，頒發給每個滿族將領研讀，直到乾隆時代仍是如此。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十記載：

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忠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清翻《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略。

額勒登保是一個行伍出身的、以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出名的武將。他的看家本事，也不過一部《三國演義》。

## 二

毛澤東博學多才，酷愛讀史，也愛讀古詩和古代小說，令人景慕。如果說讀詩是為寄寓他的藝術才情進行超功利的審美體驗的話，那麼，他讀小說卻和讀史書一樣，以他政治家的敏銳眼光，正是從小說中發現值得注意的歷史經驗。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過：「《紅樓夢》我至少讀了五遍，沒受影響。我是把它當作歷史讀。」「《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個人，其他都是奴隸。……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通。」（參見〈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他還多次勸告其他高級幹部要讀馬列的書，也要讀《紅樓夢》。馬列的書比較枯燥難讀，但毛澤東的號召確實產生了许多業餘「紅學家」。

從歷史的角度解讀《紅樓夢》未嘗不可。要了解封建社會的具體狀況，《紅樓夢》確是最形象的「教材」，可使

讀者看到許多生動的封建社會的情景。因為作者是那個時代的人，他描寫的人物、事件，人物的關係糾葛、思想感情，人物的言談舉止、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無一不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具有相當的真實性。但這個真實是藝術的真實，不是歷史事實的真實。《紅樓夢》中可能有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的影子，但榮國府絕不等於揚州織造府。小說所描寫的人物事件、故事衝突是曹雪芹時代可能有的，但不是已經發生過的。對《紅樓夢》可以作歷史分析，但不能把《紅樓夢》當歷史書。過去江青完全摹仿毛澤東的話，再加以發揮，以「半個紅學家」自居，把階級鬥爭弦繃得緊緊的。如果那樣看《紅樓夢》，這部小說不過是一些瑣屑無聊的日常流水賬，還有甚麼審美感受和文藝欣賞價值可談？



其實，《紅樓夢》在中國風行二百年，過去趕時髦的就不少。魯迅在〈絳洞花主·小引〉就曾說過：「《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最近讀到一則消息說，一位高層官員又對《紅樓夢》發生了興趣。據說他「為了批判地總結過去，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以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清醒、更主動、更自覺地為弘揚光大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理財的優越性」，而專門組織一些專家對《紅樓夢》理財問題進行研究，「確定以『儉則興，奢則敗』為主線」，寫出研究論文數篇。認為「『儉則興，奢則敗』是治國理財必須遵循的一條客觀歷史規律，也是持家籌計和辦一切事業的一個重要經驗」(見《光明日報》1992.7.18第二版)。財政是一個國家的命脈。人們不解，一個負責經濟建設，管理政府財政數十年的高級官員，要尋找理財工作的借鑒，可讀的古今中外書籍(包括馬列的書)不少，為甚麼不看別的書而單選《紅樓夢》？《紅樓夢》有何高深難解的理財理論或新穎獨到的理財經驗需要一群專家去研究？張獻忠等從《三國演義》學兵法(《三國演義》中含七分史實，尚不可純以文藝小說視之)，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讀不懂「武學七書」，我們的理財高幹也不知道或讀不懂經濟學嗎？

如果不是心存譁眾取寵之意，而是真要了解古人的理財思想和理財經驗，有一部書倒值得推薦，這就是《管子》。管仲生在春秋時代的齊國。齊國原是山東濱海方圓僅百里的彈丸

小國，介於徐萊諸夷之間，立國三百年，內亂無已時。而管仲執政後，「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管子·戒》)，成為春秋五霸的第一家。管子使齊國由弱變強的經驗有足資參考者。梁啟超對管子的理財思想評價甚高，於1909年寫成了洋洋六萬餘言的《管子評傳》。他對照歐洲近現代經濟學理論，認為管子的經濟學說有許多超出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地方。梁啟超說：

管子為大理財家，後世計臣多宗之。雖然，管子之理財，其所注全力以經營者，不在國家財政也，而在國民經濟。國民經濟發達，斯國家財政隨之。管子之所務在於是，故有以桑弘羊、孔僅、劉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

梁啟超又說：

凡善言經濟者，未有不首以生產為務者也。昧於經濟學理者，往往以金銀與富力為同物，汲汲焉思所以積之而壅其出。歐洲前代諸國蹈此覆轍者，不知凡幾也。

梁啟超把《管子》的經濟政策分為六個部分，首先分析管子的國民經濟觀念，然後以獎勵生產、均節消費、調劑分配、財政、國際經濟等的政策為序，分類引述，頗為全面。今對照前面提到的有關治國理財問題，把《管子》言說摘引數條如下：

〈治國篇〉：「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

〈牧民篇〉：「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又：「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原注：「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

〈立政篇〉：「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

〈版法篇〉：「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輕重甲篇〉：「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

〈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子母度。」

〈乘馬篇〉：「儉則傷事，侈則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

〈權修篇〉：「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管子是生活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人物，他所說的「君」、「令」、「牧民」等等都是陳舊的概念，在中國早已絕迹。本文引述這麼多管子的話，並非希望人「效顰」，不過是為汲汲需要者提供一面「古鑒」而已。